



上海金融史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金融史话

《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金融史话

·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28,000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74 389 定价: 0.42元

前 言

遵循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分工合作，先作部门史的分析研究的教导，我们尝试编写了这一本《上海金融史话》。

历史情况异常繁杂，怎样着手进行分析研究呢？这就要“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论国家》）。我们编写《史话》，也力求运用这一原则。

金融的历史是悠久的，有了货币就逐渐有金融活动，包括货币的出纳、兑换、汇兑、保管和货币的借贷等；有了金融活动也就会有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单位即金融机构。但是金融的充分发展，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了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生长，又产生了金融资本。这时的银行，已由货币收付和信用的“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货币和银行，原来被人视为复杂、不易理解的“怪物”，但是经过革命导师的科学分析，透过假象，揭示了它们的本质，也就不再有什么神秘了。

旧中国的金融，在鸦片战争后，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点，“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帝国主义在华银行，通过金融活动进行侵略，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工具之一。官僚资本银行，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服务，获取买办利润，对内则用各种经济特权和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残酷地榨取人民血汗，集中了庞大的财富，以维护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除这两种银行外，还有民族资本银行，它是畸形发展起来的，带有或多或少的买办性和封建性，虽然它的资本力量比前两者差得多，但是也曾经企图以自己的金融势力来影响政治和追求政治上的权力。

解放前的上海是旧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述三种类型的银行，或以上海为侵华的主要基地，或以上海为业务活动的大本营。旧上海的金融动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状况。这本《史话》就是试图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线索，通过几个重大事件、几个主要方面问题的通俗叙述，来反映鸦片战争后至解放这一时期上海金融历史发展的概貌。

《史话》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借款、开设银行，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帝国主义勾结和利用封建钱庄，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豢养、扶植了它的走狗北洋军阀袁世凯和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等等。看了这些史实，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

国变为半殖民地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

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这是一面，还有另一面，便是人民群众英勇地坚持反侵略的斗争。《史话》中接触到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殖民秩序；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迫使它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蔽曲折的侵略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首先在上海爆发，这一伟大的反帝革命斗争，大灭了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威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日、德、意三国在华银行不得不退出侵略的行列；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则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金融历史的结束，开始了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新篇章。

战胜敌人，改变中国面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坚韧不拔斗争的结果。建国前，金融大权掌握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它们利用金融这一工具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专政。建国后，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剥夺了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特权，接管了官僚资本银行，对民族资本银行、钱庄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银行体系和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货币制度。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稳定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国家银行，它是统一发行和管理货币的机关，是全国

的信用、结算和现金活动中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之一。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特别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干了帝、修、反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情，如果按照他们那条路线搞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让卖国的反动的金融垄断势力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回顾旧上海金融这段历史和解放后社会主义金融的发展、成长，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搞好革命和生产，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以上是我们编写这本《史话》的想法和愿望，但限于水平，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目 录

一、鸦片战争前的上海金融	1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金融的发展	1
(二) 钱庄等金融机构的成长	4
(三) 在鸦片等贸易中的金融业务活动	8
二、以上海为中心,英国银行魔爪四伸	12
(一) 丽如银行首先闯入	12
(二) 一批英国银行相继入侵	15
(三) 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金融侵略势力迅速扩张	18
三、封建钱庄买办化	27
(一) 买办是钱庄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桥梁	27
(二) 钱庄买办化凭借的场所是租界	30
(三) 帝国主义企业、银行收受远期“庄票” 是钱庄买办化的关键	32
(四) 在帝国主义银行操纵下,钱庄玩弄银两、 银元投机	37
四、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和银行团	42
(一) 六国银行勾心斗角争夺贷款权	44
(二) 银行团的组成和它的掠夺活动	53
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交”钞票停兑风潮	63
(一) 两大财政金融支柱	64

(二) 停兑风潮在上海	66
(三) 停兑风潮蔓延四方	74
六、私人资本银行的畸形发展和贪婪剥削	81
(一) 从第一家本国银行谈起	81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资本银行的发展	84
(三) 战后的畸形发展	88
(四) 贪婪地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97
七、“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金融业资产阶级	102
(一) 北方金融业资产阶级勾结南方国民党右派	103
(二) 帝国主义从中阴谋策划	106
(三) 南方金融业资产阶级附和蒋介石的反动	109
(四) 反革命交易的首次成交	111
(五) 为蒋介石政府继续输血	113
八、一九三五年上海白银风潮	116
(一) 日益恶化的蒋管区经济	116
(二) 美国“白银法案”对中国银本位的冲击	117
(三) 帝国主义在华银行推波助澜	121
(四) 上海民族工商业、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	124
九、官僚资本四大银行和“法币政策”的实施	129
(一) 四大家族建立以四大银行为首的信用体系	129
(二) 英、美对中国货币支配权的争夺	134
(三) 为加强垄断而实施的“法币政策”	138
十、日帝侵略下的战时金融	143
(一) 沪、港、渝“三角线”	143
(二) “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	147
(三) 投机狂热笼罩下的上海金融	151

十一、美蒋勾结下，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	156
(一) 抢夺胜利果实，造成惊人垄断	156
(二) 蒋帮彻底投靠，美帝全面霸占	160
(三) 以巨额外汇、黄金用于打内战	163
(四) 发行“金圆券”的大骗局	166
十二、恶性通货膨胀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171
(一) 通货膨胀过程	171
(二) 剥削者的天堂，劳动者的地狱	176
(三) 加速了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184
十三、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结束，社会主义金融建立	189
(一) 打击金融投机	189
(二) 对原有银行的处理、接管和改造	193
(三) 迅速稳定物价和货币	195
(四) 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欣欣向荣	197

一、鸦片战争前的上海金融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上海成为旧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基地。为了从金融方面了解这种演变，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鸦片战争前上海金融的历史。

上海，在宋朝建立了镇，元朝设县，明朝已成为东南名邑。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前的生息资本时说：“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资本论》第三卷）。上海的早期金融机构及其活动，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状况。那时的上海，有以贷放货币、榨取高利的高利贷资本，后来也有以货币的兑换、保管、出纳为营业对象的货币经营资本，与这些金融活动相适应的金融机构有典当、钱铺等。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货币经营业主要是钱庄和山西票号。本篇所要着重说明的就是鸦片战争前以这两种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活动情况。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金融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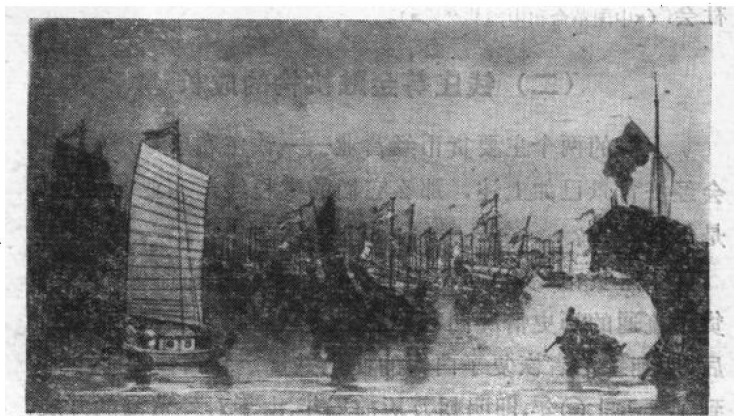
早在十二世纪末即南宋时代，上海这个在长江口、东海

滨的渔村，就发展成为沿海贸易的港口，内地货物在这里装船出海，沿海驶来的船只在此停泊，当时就有人称上海是“海舶辐辏”、“蕃商云集”之地。到了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已有五条航线集中到上海来。这五条航线即来自关东、辽东、天津、山东等地的北洋船，来自广东、福建的南洋船，自西顺流而下的长江船，沿运河、太湖、吴淞江来的内河船，还有来往于东南亚和日本的外洋船。每年进口的船只，约有七千艘，其中从海外来的有一千六百艘。它们运来的土特产、手工业品乃至欧洲出产的物品种类繁多，包括大豆、油饼、大米、丝绸棉布、乾果烈酒、山珍海味、砂糖肉桂、颜料药材、陶瓷器皿以及欧洲的工业品和名为药品实为毒品的鸦片。这些船只运来待售的货物，运回购入的商品，都需要钱兑汇划和金融调度。金融业“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金融与贸易如影随形，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钱庄的兴起。

约在元朝后期，上海地区由于传进了棉纺织的新技术，手工纺织业就有了较大发展。到了明朝，松江一带所织的布，广销各地，已有“衣被天下”之称。清初，上海手工纺织、染业中，已有专门制造纺纱锭子和织布机的行业，有专门从事漂、染、印花和整理的作坊。它们所生产的棉布，有专销山西、陕西、北京等地的“漂布”，还有专销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中机”布。由于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经营棉布的布行、布庄也很多，上海逐渐成为棉布交易的集散地，各地客商往往携带上万两甚至几万两的银子前来采购。

他们要把银锭、银块换成小额、细碎的银两和一串串铜钱到市场去交换棉布，在这中间就有一系列的出纳、兑换、汇兑和保管的工作，需要货币经营业来完成。“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帐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货币所有者投资于这种独立的货币经营业，便产生了早期的上海钱庄。

清初的上海，在世界贸易中虽然还不著名，但是已经被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从而取得海上霸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所瞩目。一七五七年，清朝政府限定只准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这对到处抢夺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不满足的。他们通过他们的政府于一七八七年、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六年先后三次向清朝政府提出另辟通商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的上海港。

口岸等要求，东印度公司在一八三二年还派遣专人潜入上海搜集军事和经济情况。清朝政府虽然在外交上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但在贸易上外国商品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上海，国内商品也在上海不断装运出口。因此在鸦片战争前，上海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已有较多的联系。对外贸易的存在，“在外国购买货物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这也就增进了对货币经营业的需要。

以上这些，虽只是一个粗略的叙述，但从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商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货币经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二）钱庄等金融机构的成长

上海的两个主要货币经营业——钱庄和票号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已如上述，那么它们的成长经过和业务活动又是怎样的呢？

了解货币经营业，不仅要看商业等对它的需要，也要看货币流通的历史情况同它的业务关系。在十五世纪中叶前后，明朝统治者恢复了白银的使用并规定和铜钱同时流通。到了一五七〇年，即明朝万历前三年，由于对外贸易的开展，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银元与银两、铜钱之间

的相互兑换,对于钱庄、钱肆的业务发生密切联系。所以在万历年间的书籍中已出现“钱庄”“钱肆”的名称,及至清朝乾隆年间,它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的行业。根据上海钱业公所的“内园”碑记所载:从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到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短短二十年中,承办这一公所事务的钱庄共有一百零六家之多。一七九七年的碑记,还有钱业公所的董事名录。由此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早在一七七六年就有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不经过百数十年



内园(今豫园一部分)。清朝乾隆年间,上海钱庄业为牟取更大利润,在此设立同业公会。

的时间，是不可能发展到这样规模的。

至于后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业务大扩展的山西票号，是乾隆、嘉庆年间一般商号兼营汇票发展到专营汇票的机构。当时因以山西人经营最多，所以称为山西票号。根据现存记载，最早成立的一家是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设在山西省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的业务以经营汇兑为主，兼营存款与放款。汇兑是一种信用行为。汇票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出来，是国内贸易发展和货币流通扩大的必然产物。日升昌原是颜料庄，在乾隆年间已有北京、天津、湖北、四川等地的分庄，那时它就兼营汇票业务，一八二四年正式改为专营汇票的票号。到一八五三年，全国性的票号已发展到十九家，它们的分号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以上的主要城市，单日升昌一家，在一八五〇年前就有十八个分号。

前文我们提到，一七五七年，清朝政府限定只准广州一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当时，清朝政府还实行对外商的管理制度，规定所有外商在广州的贸易，都必须经由清朝政府所特许的行商办理承销和代购，外国商人不得和其他中国商人自由贸易。这样，内地商人要购买进口货，就要携带现银到广州，外国商人要从上海购买畅销欧洲的生丝，也要把银元交给广州行商委托他们向上海代购。现银带来带去，不仅费事，而且还有遗失或被抢劫的危险。通过票号汇兑，购货者不用携带现银就能把价款交给售货者。商人们在委托票号汇款时虽要付出一定数量的汇费，这比携带现银省事得多，既方便，又安全，自然受到商人们的欢迎。所以，票号

经营汇兑与对外贸易也有联系。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各级政府的公款也多交由票号承汇，一八六七年左宗棠向上海外国商人借到的一百二十万两巨款，就是交由上海的票号汇到山西运城，然后转汇至甘肃充作军饷的。这表明，金融机构也总是依附统治阶级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

票号的活动遍及全国，营业的重心虽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业务上与清朝政府机关及官吏联系甚密；钱庄的发展，以长江以南地区为中心，业务上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在汇款的方式上，票号和钱庄也有所不同，钱庄是同业往来制，即委托异地的同业辗转办理汇解；票号则是分号往来制，它们利用设立在全国重要城市的分号，直接相互通汇，只有在没有设分号的地方才转托其他票号或钱庄。一般说来，钱庄营业对象的重点在本地区，外埠不设分庄，票号则分号遍设全国，在全国性的汇兑上，票号的作用更大于钱庄。

金融机构中除钱庄、票号外，还有典当。典当业的历史更为久远，南北朝时已有这种行业，隋唐以后逐渐发展，明末清初，一家大典当的资本额往往有几千两以至几万两，一面承做有实物作抵押的贷款，一面也收受存款。典当的利息极高，越是小额质押，利率越高。票号与钱庄对典当的营运资本的扩大，往往提供便利条件，所以票号、钱庄也就成为高利贷活动的支柱。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典当开得不多，主要分布在县城内和附近乡镇上。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时，起义军当局曾发出布告，禁止典当剥削，命令城内六家典当，“无论满年近日（即到期或未到期）一概让利”，并由起义军“设立一局”，在城外代为取赎。到了六十年代，人民日益